

▶ 现在位置: [首页](#)>[期刊文章](#)

[【小中大】](#) [【打印】](#) [【关闭窗口】](#)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科学文化评论》第4卷 第3期 (2007) :

科技与社会

李石曾与近代学术界留法派的形成

刘晓^[①]

摘要 20世纪初年,痛感于满清政权的衰败及列强的侵略,李石曾和一批志同道合之士留学法国,由此揭开了一系列留法教育运动的序幕。李石曾引进法国先进科技与文化,改良中国社会的留学理念贯穿整个运动,他从创办巴黎豆腐公司培训赴法华工开始,先后发起留法俭学运动和勤工俭学运动,又创建中法大学,几经曲折,数十年内培养了大量留法人才,逐步在民国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为首的留法派,为后来模仿法国制度实施教育改革和建立以留法学者为主体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打下了基础。留法教育运动的成就,以及后来暴露出来的若干弊端,又都与李石曾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政治信仰,乃至个人性格有着一定的关系。李石曾及其领导的留法派在1920年代后期成为我国教育、学术界一支堪与留英美派相并肩的重要力量,不仅促进了中法两国间的科技、教育与文化交流,也奠定了民国时期学术界的基本派系格局。

关键词 李石曾 留法教育 勤工俭学 中法大学 北平研究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少学人曾提到,当时中国教育和学术界存在着英美派、留法派之说。这里的英美派和留法派,分别指的是曾经留学英、美(也包括德国等欧陆国家)和留学法、比、瑞士等法语区国家的学者。20世纪初年,教育界本以留日派居多,留日学生中也出了不少人才,如鲁迅兄弟、沈尹默、冯祖荀、李四光、张季鸾、张东荪等。但从1909年美国将部分庚款用于中国兴学起,大批青年开始转向留学美国。由于英、美文化承传的关系,加上两国的高等教育都吸收了19世纪德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经验,又具有较好的选拔机制和充足的经费,这些学生中许多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组织了科学社,英美派一说即逐渐浮现并渐成气候,回国后成为学术界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他们拥戴蔡元培、胡适等为领袖人物,在教育、学术界的大将包括梅贻琦、蒋梦麟、陈西滢、竺可桢、任鸿隽、赵元任及胡(明复、胡敦复)氏兄弟等。与此同时,早年留法的李石曾积极推动国内学子到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留学,以求将学习先进知识的途径拓展到更广的西方世界。这一趋向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以李石曾为首的留法派,学界主要成员包括易培基、李书华、褚民谊、李麟玉等,从而构成与留学英美学人抵角相争的局势。而感到遭受边缘化危机的留日学人,如沈尹默、顾孟余、周(树人、作人)氏兄弟等,更多地体会到英美派咄咄逼人的挤压,也转而支持李石曾。因此留法派在当时的教育与学术界形成一股不容小视的力量。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造就留法派这一群体的关键人物李石曾及其所推动的留法教育运动。

关于留法教育运动,以往研究已是汗牛充栋,^[②]但由于大多数作者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其中的勤工俭学运动的政治意义上面,李石曾等人的主导作用往往被忽视甚至遭到否定,作为整体的留法教育运动对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影响也缺乏系统的梳理。诚然,勤工俭学运动在短期内造就的一批共产党人,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政治进程,但是延绵发展近半个世纪的留法教育运动的初衷——培养人才振兴教育学术以改造社会,则被李石曾贯穿始终,这一评价该运动的核心因素,往往被许多研究者忽略了。

留法教育运动可以溯源到1902年李石曾离乡赴法,而正式的发端是他后来在法国开展的华工教育和俭学运动,高潮则是1919年的赴法勤工俭学和1920年中法大学的成立,最后这一举措使得中国在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不断向法国派遣留学生;其间李石曾于1928年力主模仿法国进行教育制度改革,随后又致力于北平研究院的筹备与建设,继续派遣年轻人到法国深造。可以这样说,以留法学者为主体组成的国立北平研究院,作为这场持续数十年之久的社会运动的最突出成果,足以说明留法派在我国学术界的规模和质量。因此,追溯核心人物李石曾推动留法教育的经历,不仅能够说明当时何以能够推动较大规模的留学运动,又为何选择法国,同时可以揭示学术界以李石曾为首的留法派的形成过程,这对我们理解民国时期学术界的派系格局,乃至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制度的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文化评论

李石曾（1881—1973），名煜瀛，祖籍河北省高阳县，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子。李自幼聪慧，六岁开蒙，习四书五经。中日甲午战争后，重掌军机处的李鸿藻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也转变了对后代的教育方针。他为石曾兄弟延请到时称学贯中西的同乡，也是著名维新派人物齐澹亭为师。从业师那里，少年李石曾了解到世界和中国的形势，也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皇室成员和在京官绅多举家南逃，李石曾全家也因避兵燹辗转迁到光州（今河南潢川县）。[③]次年战事甫告结束，李石曾便只身回京打探消息，在京郊贤良寺谒见了正与联军议和的李鸿章，谈及留学的想法。其时李鸿章已是老病缠身，环顾左右，竟无一人能出来支撑局面，他自己的阳寿也只有一个多月。大厦将倾，内外交困，在这样惨淡悲凉的环境中，李鸿章盛赞其师齐澹亭为洋务高材，并不计前嫌，毅然支持政坛宿敌的公子出洋留学，李石曾在其晚年所著的《石曾笔记》中对此还感铭不忘。[[李石曾 1980b, 页33]]

1932年的李石曾，时52岁，（图片来源：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

出身上流社会的李石曾，青少年时就切实感受到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清政府的腐败衰弱，从而立志学习西方，及至后来又参加了反满革命活动。应该说，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促使一大批有为青年选择了同样的道路。如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等，就同李石曾一样，通过留学接触到保种图存的新思想，直到追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又主张科学教育救国，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李石曾于1902年赴法留学，被有的人称为“中国留法第一人”。[④]李选择留学法国有些出于机缘巧合。他本来学习英文，想到美国留学。1902年适逢曾任军机处官报局局长的孙宝琦出任驻法大使，孙家与李家本是邻居，李鸿藻既是孙宝琦的顶头上司又与其父户部侍郎孙诒经是好友，加上李鸿章的力荐，李石曾遂与张静江、夏循培等三人以随员身份偕行。

李石曾后来推动留学运动的想法最早来源于吴稚晖。吴氏长于史论，幼习桐城派文法，1892年入京会试时的主考官正是李鸿藻，按旧例吴称李鸿藻为“座师”。甲午之后吴的思想趋于激进，曾留学日本，在江沪一带颇有猖狂名气。李石曾初次赴法途径上海时曾拜访过吴稚晖。谈到留学法国的题目，吴稚晖主张以“苦学”、“俭学”的方法，达到多数人游学的目的。[[李石曾 1980b, 页72]]他对李石曾说：“这一次，你们去法国，机会难得，以后最好能帮助国内青年也多有到法国的机会，以便吸取西洋知识，为国家造就人才；而且人越多越好。到国外吸取新知识，人不厌其多，但也需有人引荐。你们此去，等于打前锋。”[[陈纪滢 1982, 页35]]李石曾深以为然，后来正是吴稚晖在若干关键场合推动了留法教育运动。

在法国补习半年法语后，[⑤]李石曾于1903年获入蒙城农业实业学校(L' Ecole d' agriculture du Chesnoy)，先读预备一年，再入正科两年，至1906年8月获得毕业文凭。在蒙城农校的几年里，李石曾接触到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多自由思想，对百科全书派、拉马克的进化观、孔德的社会历史观以及蒲鲁东的社会主义颇为钟情。[[Basid-Bruguière 1998]]1906年暑假毕业后，李石曾到巴黎，进入巴斯德学院(Institut Pasteur) 随柏尔唐(Gabriel Emile Bertrand, 1867—1962)进行生物学研究。此时他又结识了地理学家邵可倡(Paul Reclus, 1837—1916)，后者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埃利赛·邵可倡(Elisée Reclus, 1830-1905)的侄子，他引导李石曾进一步接触无政府主义思想，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拉马克的生物互助并存论。在邵可倡的影响下，李石曾成为在法的中国留学生中全面接受无政府主义之第一人。[[李书华 1974, 页42]]

李石曾和张静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张本人也结识了法国的若干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思想日趋激进，立论怪特，隐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宣道师自任。[[冯自由 1987, 页210]]1906年初吴稚晖到巴黎时，受到李石曾的影响也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李、张、吴三人遂共同组织世界社，编印《新世纪》周刊(Les Temps Nouveau)及《世界画报》(L' Illustré Mondia)。世界社是李石曾等人的终身事业，其宗旨是“发扬学术”、“普及文化”、“改进社会”，从传播革命学说开始，渐渐扩展到著述出版、学术研究、教育文化和社会经济四项事业。[[李石曾 1980b, 页41]]李石曾则身体力行，不断以“真”、“真民”等笔名，发表言论，主张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值得指出的是，世界社的教育文化事业，被分为“设立学校”和“介绍、组织留学”两方面，可见推动留学运动已成为李石曾及其同仁理想的一部分。

在学业方面，李石曾尝试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证明其营养成分与牛奶相仿，并可以替代肉食。李为此颇为欣喜，称之有“极伟大之功用”。[[李石曾 1930, 页16]]因为按照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奉行的建立在互助进化论基础上的生命伦理，食肉乃是蒙昧时代弱肉强食的残迹，人类最终应该实行素食。1907年李石曾在巴黎分别用中文和法文发表《大豆的研究》(Le Soja)专著[⑥]。1908年，他赴法六年后第一次回国，甫及上海，就开始宣扬素食主张。他与伍廷芳共同发起素食会，开设素食馆，会与馆均以黄秀伯[⑦]手书“慎食卫生”为词。[[李石曾 1980b, 页33]]李石曾还专为素食会写了《肉食论》一书，认为食肉有害而无一利，食肉和食素是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察肉食之流弊，知当戒之理由，论素食之利益，推而及于人格之文明，社会之经济。”[[李石曾 1980a, 页275]]李石曾律己度人，言行一致，自此终生素食。

在20世纪初的巴斯德学院从事大豆研究，大概不能算作一项十分有创意的工作，但是这毕竟是中国人利用现代化学知识和仪器，对人类一种主要食物营养成份进行的科学分析；更重要的是，在青年李石曾心目中，这一研究与他的社会理念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说，李石曾在巴斯德学院实验室中从事的大豆研究，构成了他日后推行的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社会实验的前奏。受到大豆研究成功的鼓舞，1907年他与夏坚仲[⑧]等发起筹建远东生物学会，通过该会向西欧介绍中国大豆制品及其技术并打入市场，这在当时西方科技与洋货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背景下，可以说是中西科技交流上极为少见的一例。[[洪震寰 1995, 页211]]

为实现创办豆腐工厂、把中国豆制品引入法国的计划，李石曾1908年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招股集资和招募工人。李石曾先到家乡高阳县布里村与好友段宗林[⑨]商议，制定出招股集资、开办训练班和在巴黎设厂计划。随后他又赶赴天津，谒拜其父昔日门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是时李家长姊之子祈景沂正在杨幕，由祈引见拜会。杨对他的实业计划颇为嘉许，许以直隶省公股的名义投资30万元。同时，杨士骧还允由天津海关道拨给李石曾在法国建立的“远东生物学会”经费每月450两银子。[[洪震寰 1995, 页20]]李石曾此行招股大获成功，所募资金除了用来开办豆腐公司之外，又以多款项组织印字局，编印《新世纪》月刊。[[萧瑜 1975, 页31]]辛亥革命之后，满清政府被推翻，这笔由地方官吏资助的公款也就不了了之了。

几个月后，李石曾与其塾师齐澹亭之子齐竺山带领第一批工人5人，由北京乘火车经西伯利亚来到巴黎，在西北郊区哥伦布(Colombes)地方设立中国豆腐工厂(Usine Caséo- Sojaïne)，聘齐竺山为经理，以大豆为原料制造各种食品和用品。除了生

产中国传统的豆制品，公司还生产法国人习惯食用的豆可、豆咖啡、点心以及各种罐头食品。1909年初，万国食品博览会在巴黎召开，该厂生产的豆腐产品参加展出，在会上颇引起轰动。

李石曾创建的巴黎豆腐工厂（图片来源：《旅欧教育运动》）

从1908年至1913年，巴黎豆腐公司共招收四批计68名工人，均为男性。⑩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和工艺技能，李石曾在厂内办了一个工艺技校，实行以工兼学，利用工休或晚间学习中文、法文、数理化 and 修身等课程，并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这种“以工兼学”已略具后来勤工俭学的雏形，因此许多人将巴黎豆腐公司的夜校看作留法勤工俭学的开始。如周恩来在留法期间写的《留法勤工俭学之大波澜》一文中说：“李氏之意，以为同一做工，与其在国内勤工终日，仅得一饱，毫无生趣，若出国做工，其利有八：（一）出国可以得普通知识，放大其固有的窄小眼光，开展其闭塞心理；（二）入工厂做工可渐习机械的运用与科学的技能；（三）与法工人常处，可习其团体生活组织能力；……（七）借此机会，可施于相当教育；（八）因其外国人之需要与知识欲的兴起，渐有求学的倾向。”【周恩来 1979, 页4】李石曾后来也说，他创办豆腐公司，一是实验大豆的功能，一是实验勤工俭学可否。

豆腐公司夜班（图片来源：《旅欧教育运动》）

更确切地说，李石曾的“勤工俭学的试验”，早在1907年就开始了。在巴黎，吴稚晖与李石曾、褚民谊同居宿，实验节俭之生活，生活费较普通减少一倍：每月房租15法郎，饭费60法郎。【世界社 1916, 页49】同年蔡元培到柏林，也实行俭学。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一方面是受经济所限，但更多地与他们信奉无政府主义，因而鼓吹人人平等的平民主义、劳动社会有关。李石曾在工人中也提倡互助精神与简朴的生活，制定戒约，使他们通过学习教育，做到“烟酒赌博之风，为之绝无”。豆腐公司的这种戒约在他后来发起的进德会、社会改良会和留法俭学会会约中都延续下来。

由于法国人尚不习惯豆制品的味道，这个小本经营的豆腐公司成立5年来一直不见起色，每月销售额只有区区五百法郎，故此需要的工人也就有限，显然达不到吴稚晖向李石曾提出的“越多越好”的目标。另一方面，工人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更缺乏外语基础，与正规留学生还有不少差距。但随同工人来到法国的已有一些自费留学生，其中就包括后来的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11】。根据《旅欧教育运动》中的记载，这些自费生与工人“同宿同食，每人每月饭费，四十余法郎已足。”【世界社 1916a, 页50】因此，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和褚民谊等人根据自身及豆腐公司内自费生的经验，以俭学的方式介绍国内青年留学的设想开始付诸实施。

二 早期留法俭学会

辛亥革命前，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和蔡元培等人都曾钟情于无政府主义，但他们也深知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因此又都不约而同地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受到无政府主义社会进化思想的启迪，李石曾把教育和革命视为社会进化的手段，不过按照他的理论，革命是“消极的进化”，教育才是“积极的进化”。

辛亥革命后，在李石曾看来，革命既已成功，作为“积极的进化”之手段的教育就应成为最重要的事情。1912年4月，李石曾与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一道，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以实践他们从教育入手改良社会的理想。汪精卫还从《老子》、《荀子》中撷得联句，为俭学会写了一副对联“俭故能广（老子语），学以愈愚（荀子语）”。【萧瑜 1974, 页8】《留法俭学会会约》规定俭学会的宗旨在于“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世界社 1916a, 页51】由李石曾起草的《留法俭学会缘起》中则明确写道：“改良社会首在教育，欲输科学智识于东亚，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宿称浩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商，拟兴苦学之风，广开留欧学界，俾青年子女得吸收新世之文明而进益于社会。”【李石曾 1980c, 页212】

留法俭学会会所设在北京船板胡同义兴局【12】。从会约来看，该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无会长等名目，只由会员中推定数人分任义务，欲留学或愿尽义务者皆可为会员，不需交纳会费，凡能负担起200元的旅费和每年600元的留学费用，就可望留学法国。其时适逢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便由教育部拨给安定门内大方胡同原师范学校旧址作为校址，供俭学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所用，学生在此补习法文半年方可出国。校务则由李石曾的高阳同乡及同塾密友齐竺山、齐如山兄弟和吴山等主持，又聘外交部顾问法国人铎尔孟（André d' Hormon）担任教习。第一批学员有徐海帆（廷瑚）、李书华（润章）、李宗桐（玄柏）、李宗侃（叔陶）、汪申（申柏）、彭济群（志云）、魏树勋（希尧）等共二十余人。从该名单可以看出，学员不仅大多是河北籍人士，还有许多是兄弟关系，这说明此时的留学活动带有鲜明的地域和家族色彩。也有个别考取公费的学生，如考取留日公费的李书华、徐廷瑚等人，将公费转到留法俭学会成为俭学生。在这些人中，产生了李书华等留法派的多名骨干成员。【13】

1912年11月，第一批俭学生赴法前在北京合影

随后吴玉章、朱芾煌等人在成都组织了四川俭学会并设立一个预备学校。李石曾还在北京设立“留法女子俭学会”。按李石曾等人的理想，希望在五年内将三千左右学生以俭学的方式送出国。吴稚晖甚至提出“移家就学”的主张，即父母子女一家人都移往外国，一面鼓励成年人拓展见识，一面便于子女自幼接受新鲜知识。但是，一年600元的费用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国内的反响并不热烈。1912年底第一批赴法俭学生仅有三十余人，1913年的第二批也为三十余人且几乎全部来自四川一省。1913年二次革命事起，袁世凯下令拘捕各省国民党人，李、蔡、吴等人都难以在国内立足，因此先后游走欧洲。1913年第三批学生刚送走不久，北京的留法预备学校即因遭教育部当局索还校舍而被迫停办。

留法俭学生到达法国后，先是在巴黎蒙达尼中学所办中国学生班学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学生又随法国政府迁往西南部，李石曾等人迅速成立“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来帮助学生维持生活。虽然李石曾仍力求维持，如拟通过保险公司代理学费。【李石曾 1980d, 页310】但在战时的条件下招募新生与维持现状都日益困难，这一成立只有两年的俭学会遂告停顿。

李石曾每在一处经营事业，必与当地人士深相结纳，互相援引。在俭学会活跃的两年多时间里，李石曾结识了法国社会党活动家穆岱（Marius Moutet），后者出身寒微，当时未满30岁，而李石曾慷慨出手助其竞选社会党议员。后来穆岱进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终其一生赞助李石曾的事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良友。[[萧瑜 1975, 页31]]李石曾亦由此与法国政界建立了联系，进一步结识欧乐（Aulard, 1849—1928）、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 1872—1957），雷宾（Lépine Jean）等政治家。这些人后来都积极支持李石曾成立的华法教育会、中法大学，并在争取法国退还庚款问题上出力相助。

三 留法俭学运动和勤工俭学运动

袁世凯复辟失败一命呜呼后，国内政治气候好转，留法教育事业又开始复苏，李石曾吸收了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调整了留学策略。学习西方的科学实业，乃至造就大学问家[14]，无疑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物质条件。俭学会对留学生的知识水平不加限制，只要能支付基本费用，不管男女老幼咸可留学，造成一些留学生因基础太差而无法直接接受高等教育，花费数年时光在中等学校或语言学校上。即使这样，因学费高昂所限，通过大规模留学以改良社会的目的仍无法实现。面临这一局面，李石曾等人从豆腐公司以工兼学的实践中受到启发，致力于进一步降低留学费用，力图扩大留学生的数量。在重新组织俭学运动的同时，又发起勤工俭学运动，终于在1920年前后形成新一轮留法高潮。

实际上，所谓两千勤工俭学生里面约有三分之一是俭学生，有的本来就领取官费或半官费，许多勤工俭学生后来也因得到官费或家庭资助，转为俭学生。

勤工俭学最初是在赴法华工中进行的，可以说是李石曾豆腐厂华工教育的延续。先是1913年原豆腐厂工人李广安等人联合创办了“地浹泊人造丝厂”，齐竺山等人在法国又组织“劝工公司”，从河北省招来48名工人到该厂做工。1915年春，李石曾携吴稚晖、蔡元培等前往参观考察，共同宣讲以工兼学的要义。[[世界社 1916b, 页71]]李石曾发现，劝工公司以商业模式组织华工来法的做法流弊甚大：公司为盈利，过多侵占工人利益；而工人积累有限，无法实现数年后就学的目的，因此“早晚必成为资本家利用工人的组织无疑；若果形成此局面，必有工人革命之举动。”退一步说，即使工人将来成为小富翁，若不实行工余求学，“个人以积资回家买田为宗旨，而置工余留学于不顾，亦非好结果也。”[[李石曾 1980d, 页308]]因此必须在工人中推行工余求学、以工兼学的制度。在李石曾的指导下，劝工公司解散，人造丝厂也办起了类似豆腐公司的夜校，李广安等人完全接受了“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世界社 1916b, 页80]]的主张，成为后来组织勤工俭学运动中的骨干。

这些工人同宿同食，费用低廉，且能通过教育提高自身素质，这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工团主义目标一致。李石曾还预见战后法国工人缺乏，势必需要大量华工，由此他萌发了将华工教育与无政府主义传播联系起来的想法。他在给吴稚晖的信中写道：“此事若能推广普及，于工人教育，所益甚多。如豆厂系厂之组织，来千百华工，非难事也。”[[李石曾 1980d, 页306]]蔡元培对李石曾工余办学的创举十分赞扬，他在为李石曾撰写的《勤工俭学传》序中指出：“昔者李石曾君之创设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设为以工兼学制。试之有效，乃提倡俭学会……由于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世界社 1916b, 页74]]在李石曾、蔡元培的筹划下，1915年6月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李石曾为其作《勤工俭学传》，[15]拉开了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初期的勤工俭学会，主要限于在法国开展活动，首先是在赴法华工中进行宣传教育，如编印《勤工俭学传》，主办《华工杂志》等。

果然，随着欧战的进行，法国出现了劳力不足的问题，1916年5月，时任袁世凯政府的税务处督办和交通银行行长的梁士诒与法国公使签约，由梁成立的惠民公司招募华工赴法参战。至1917年，通过惠民公司办理的赴法华工已达20万人。[[李吉奎 2005, 页115—116]]为了维护这一巨大的劳力市场，也便于对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华工进行管理，法国政府请李石曾代为拟定华工教育方案并主持之。1916年3月29日，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汪精卫与法国人欧乐（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穆岱（时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等，召开华法教育会筹组会。1916年6月26日华法教育会（Societ e Franco- chinoise d education）正式成立，由蔡元培、欧乐任会长，穆岱、李石曾任副会长。华法教育会延续了世界社的理想，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文化交流，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世界社 1916c, 页105]]华法教育会的工作目标分哲理与精神、科学与教育、经济与社会等三部分，包含了学习法国教育、介绍中国留学生来法、组织留法工人教育等内容。华法教育会还与惠民公司在华工教育组织方面取得共识，并与法国陆军部协商，修改了由北洋政府签订的关于华工问题的合同，特别规定要保证华工的文化学习。

李石曾的初步计划是，在已到法的华工中挑选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授以普通知识及中法文”，然后将他们分派到华工比较集中的各个地方，“以工余转教华工”。[[刘桂生、赵原璧 1998, 页182]]遂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招考教师，首批招得二十四人，[16]许多系豆腐公司的工人。主要学习课程有法文、中文、算学、工会组织等九科。李石曾亲自演讲人生术，即卫生、修身诸问题。[[世界社 1916b, 页85]]他们学习不到半年，便被委派接待新到华工。后来北平研究院基金会干事杨梦游即是其中一员。

巴黎华工学校（图片来源：《旅欧教育运动》）

华法教育会还接受法国招工局之托，派李广安回国到云南、广西招工。[[周天度 1984, 页78]]李石曾、蔡元培等分别向国内各行政机关写信，说明华工赴法的好处：“一曰扩张生计，二曰输入实业智识，三曰改良社会。”[[世界社 1916b, 页82]]年内即招得工人五千，到法后均由华工学校的学生照料。

法国政界虽然支持华工教育，但军方对调走有文化华工充教员的做法并不积极配合，为此李石曾又想到一个对策，即直接到国内招收具有更高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来勤工俭学；即使找不到工作，也可籍此对工人进行教育，兼做翻译。按照他的设想，将导致“数千学生为改良中等社会之要素，数千工人乃改良所谓下等社会之要素。”[[李石曾 1980d, 页309]]这样发展下去，李石曾的“世界大同”理想则有望实现。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内政治形势好转，李石曾、蔡元培等立即回国，一面恢复俭学会，一面宣扬勤工俭学。

李石曾先在广东、福建等国民党势力较强的地方宣传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坚请李石曾至北大任教。4月，中断四年的北京留法俭学会恢复活动。1917年5月，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北京挂牌，并再版《勤工俭学传》，编印《旅欧教育运动》，刊行《旅欧杂志》。

1917年夏，李石曾与时任北大庶务科长的段宗林商定，在其家乡布里村即当年招收与培训豆腐厂工人之地设立一所初级留法预备学校。这是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国内设立的第一所专门培养留法学生的学校。1918年秋迁入新校舍，改名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同时增加了实习工厂，学生可以在校内进行钳工、锻工等工艺实习。

同年9月17日，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参加了开学典礼。李石曾在讲话中极力鼓吹留学法国之优越，提出法国一是学术先进，二是学校比较平民化，适宜俭学。[[李石曾 1980e, 页227—229]]在这次大会上，蔡元培也提出华法教育会拟于预备学校之外，另组织一华法中小学校，外国语则用法语，毕业生或进本国大学，或赴法留学。[[蔡元培 1979, 页177]]此即为后来中法大学的发端。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此时迅猛发展有其特殊的背景。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蔡元培等积极宣扬工读主义，提出“劳工神圣”论；吴稚晖则强调“学止为工之预备，工止为学之实施，学者当工，工者亦宜学。”[[世界社 1916b, 页78]]李石曾更是把提倡勤工俭学，帮助他人求学，视为互助进化，进入大同世界——无政府理想境界的实践。因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时，许多报刊大力宣扬工读主义，各地纷纷成立工学互助团。效仿北京的做法，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直隶、山东、福建等省市相继出现华法教育会，全国各地建立留法预备学校二十余所，如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高等预备学校、北京法文专修馆、北大留法预备班、上海留法勤工俭学生俱乐部等。华法教育会积极与法国轮船公司联系，开设廉价的四等舱位，赴法旅费仅需要100元大洋。1919年5月初，第一批勤工俭学生90人，由上海经海路到达巴黎。为迎接分批到来的学生，华法教育会设立学生事务部，协助留学生解决工作或入学问题。6月李石曾赶回法国奔走留学事务，当年陆续到法者约有七百人。

然而，这种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粗放留学方式很快就遭遇挫折。特别是1920年到法的一千多人中，大多数无经济来源，又逢法国经济凋敝，物价高涨，加之大批军人复员，觅工不易，许多人陷于无工可做的境地。根据华法教育会学生管理事务部1920年11月的报告书，截至到当年10月，到法学生共计1414名，其中送入学校579名，送入工厂498名，死亡失踪7名，住院8名，中途回国者13名，转学他国者14名，声明脱离关系者41名，服务基督教青年会者18名，因打伤工人被羁押者11人，剩下220余人加上后来失工失学者，则处于流浪失所等待救济中。[[李璜 1974, 页22]]华法教育会面临困难境地，虽竭力维持，每日发给失学失工人员5法郎的维持费，终是杯水车薪，而来源不继，引起了学生们的普遍恐慌，许多学生病倒。李石曾也因操劳过度引发肺病，于1919年12月回国疗养。

1921年初，蔡元培、张申府等人到巴黎了解情况后，蔡将当时勤工俭学之现状电告教育部，教育部遂于1月8日发布停送勤工俭学生的公告。[[李书华 1963, 页43]]最后一批到法的勤工俭学生约在1921年2月。由于在法国失学失工的勤工俭学生陷入无助的境地，1921年相继发生了包围驻法大使馆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两件对勤工俭学运动带来致命伤害的事情，部分学生被遣送回国。经过中法政府双方协商，1921年5月组织中法委员会 [[李璜 1973, 页17]]，共同出资（实为法方单独出资）对勤工俭学生进行紧急生活救济，部分遣返，部分代觅工作。[[霍益萍 1997, 页150]]

国内方面，在李石曾、张继等人的努力下，一些勤工俭学生得到政府的救济。如广东籍学生九十余人获陈炯明支持得到各县公费资助每月一百大洋，发至毕业回国；北方晋冀鲁豫各省近百名学生经张继的活动，陆续得到各省公费；阎锡山还为山西籍20余名学生派来监督一名；四川当局给川籍学生汇寄了临时救济款10万余元。江苏、浙江、安徽的学生也多数得到公费与家庭的救济。中法大学海外部也逐年从勤工俭学生中择优招收一批人入学。勤工俭学生中有女生30余人，得到一名乐善好施的贵妇人的救济，每人每月供给300法郎。[[李璜 1978, 页72]]至1922年底，大部分勤工俭学生的生活问题，已基本获得解决。在以后的十余年内，许多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们陆续回国后，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留法派的一股重要力量。如后来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即为1918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1920年留学法国并最终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李石曾对勤工俭学运动用力甚巨，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曾说过：“我是不从事政治生涯的，政治上无论如何腐败，我可以忍下。若有人破坏我的留学事业，反对我教育运动，充其量我可以牺牲一己之性命以办事。”[[公孙旬 1992, 页158]]蔡和森等人与李石曾的通信中，也称李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坚”。李石曾欲独立于政府，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和学生自费实现大规模留学，以期形成规模，起到改良社会乃至实现世界大同的目的。然而勤工俭学运动后期局面几近失控，许多人转向了社会革命，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除客观因素外，这与李石曾的个人理念和做事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早期勤工俭学运动中存在不同的思想路线，李石曾发起这一运动本身就包含着社会革命的意图，后来运动中出现更激进的倾向也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不无关系。无政府主义同共产主义一样，反对资本家剥削，认为劳动致富是资本家引诱工人堕落的手段。李石曾还设想工人做工若干年后便可积累足够学费，学习工农诸学，“数年后可成一工党基础，不但有工党之思想，且有工党之能力。”[[李石曾 1980d, 页308]]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接受无政府主义后又转向共产主义的。

在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过程中，李石曾等正是以无政府主义观念为主导，推崇自由结合与互助精神，实践工团主义，但对华法教育会等机构的组织建设掉以轻心。事物极为庞杂的俭学会、勤工俭学会甚至不设会长，主持人物在后期也没能充分尽到责任。李石曾早于1919年12月回国，养痾数月又忙于中法大学事务。张继于1920年6月回国，会计刘大悲亦不堪重负，于10月辞职。有一段时间，华法教育会只有四位职员在那里维持业务。是年8月，蔡元培、李石曾派高鲁到法国督察工作，但后者因同时兼有多项任务未能尽力，蔡元培更是分身乏术。李石曾只有委派亲信齐荣卿、李广安、曾仲鸣等人主持一切。而豆腐公司和华法教育会几乎被其高阳同乡所把持，这就很难给人公允的印象。

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厌恶权威，尽可能地拒斥官方干涉，表现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其主观意识是力求避开政府干预，而依靠社会、家庭乃至学生个人的力量。而一旦出现大批勤工俭学生不能进入工厂，这些非官方组织的救济能力就捉襟见肘了。在动用了各种渠道向国内地方政府求助无望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由中法两国政府出面进行善后。这一教训使得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开始重视利用政治资源为教育事业服务。他们和蔡元培等人一道，不久即运用政府款项和庚子退款创办了私立中法大学。中法大学的私立性质，以及后来鼓吹教育独立，李石曾等人摆脱官方羁绊的意图仍清晰可见。

李石曾、吴稚晖等成立中法大学的想法，仍可上溯到上文提到的世界社。在李石曾的世界社体系中，教育一项包括创办“世界大学”，而中法大学就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实现。随着留法教育运动的发起和壮大，在1912年前后，李石曾与蔡元培关于“中法教育”的想法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1917年，李、蔡等人在国内继续推进留法俭学活动，在北京开办法文预备学校，同年在华法教育会原址方家胡同成立孔德学校。以此为开端，最后发展成为拥有35个分支机构的中法大学，里昂的海外中法大学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倡设立海外中法大学的是吴稚晖。1918年底，正热心于推动勤工俭学的他发表了《海外中国大学未议》，文中称：“海外中国大学者，将中国大学暂设于海外，……迨至开办若干年，筹备略齐整，教团亦组织粗完，遂并可迁之教具及已形成之校风，完全迁移于本国应设之地点。”[吴稚晖 1969, 页3—4]列举种种海外办学的优点。文章刊出后，首先得到蔡元培与张静江的赞同。此时李石曾正好在巴黎，蔡、张、吴等遂致信李，介绍这一设想，谓现时到法国留学者众，应有一种固定永久之组织，并使中国学术亦不荒废，而得收中西学术沟通互证之功，故请他就近先在法国寻觅机会。[[李石曾 1980f, 页234]]之所以选择法国，除已有华法教育会这一基础外，还有一层背景，盖因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退还庚子赔款的要求，李石曾等人力主将这笔钱用于教育事业，在法国建中国的大学正好可以利用这笔款项。

李石曾接到信后，立即提议在巴黎召开华法教育会理事会，法方参会的有里昂市长赫里欧、国会议员穆岱等。赫里欧表示，里昂西郊的三台山上有废弃兵营一座，如果需要，市政府可以拨给。穆岱也认为，里昂与中国通商历史悠久，如在此地设华法学校，必受当地社会欢迎。于是华法教育会法方会长欧乐宣布，法方对创办中法大学予以积极支持，并要李石曾将此意见转达中方理事。[[罗平汉 2002, 页124]]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épine Jean）则认为：“退还庚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恐怕候款太久建设中国大学之事反至无形消灭。不若先得一校舍，由中法分担小款，办一个雏形，可促成庚款的退还。”[[吴稚晖 1995, 页117]]1919年12月6日，该提议获得法国大学会议通过，并委托里昂大学办理一切事务。由于得到法国方面在房屋、经费上的初步承诺，加上里昂地方商会又有支持意向，设海外大学一事至此略具雏形。其时适逢参加巴黎和会的中方首席代表陆徵祥专使欲回国，李石曾即专程前往晤谈，陆亦极表赞成，谓回国后必向政府竭力陈述，并保证常年费用10万法郎的调拨。[[李石曾 1980f, 页234]]法国方面则回应说，将以同等数额的经费予以配比。

1920年1月，李石曾到北京，具体安排筹措开办海外大学的经费与招生事宜。他将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又扩充陆谟克[17]学院，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

1月22日李石曾赶赴上海与吴稚晖商讨创设中法大学事宜，恰逢流言广东军政府因得到盐余和关余[18]的巨额款项，正谋划拨出一笔专款设立西南大学，吴稚晖便想到以此为名争取地方军政府的财务支持。于是李、吴同往拜见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得到孙的支持。[[刘厚 1974, 页2]]2月19日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等人赶赴广州，持孙中山函见岑春煊、伍廷芳两位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允拨开办费30万元，赞助创设里昂中法大学。26日，军政府政务会通过“西南大学大纲”，明定“本大学设本部于上海，酌设部分部于海外”，并增聘吴稚晖、李石曾等为里昂海外部筹备员。核定100万大洋创办费，其中20万用于海外部；年度经费每年70余万，其中20万拨至里昂。[[陈三井 1980, 页369]]三日后，海外部领得开办费15万港币，交汪精卫与李石曾。不幸西南大学后来引发校址之争，而专款又充作了军费，竟半途而废，原定里昂中法大学的年度经费也就无从着落了。

李石曾回到北京后，经过努力又从北京段祺瑞政府和北京大学各筹得款十万元。10月吴稚晖会见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向其建议由省政府每年拨8万元作为选派粤籍学生到里昂海外部学习的经费，获得陈的赞同。

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凑齐了必要的开办费，常年费也暂有保障，于是里昂市以每年1法郎的象征性租金，将位于其西郊山坡上的旧炮台——圣·伊雷内堡（Fort St. Irénée），租给中方作为建校场所。华法教育会委托褚民谊负责修理，费时一年，耗资百万法郎，才将其改为民用建筑。

1921年6月，中法两国就海外中法大学正式签订土地租让协议，法方代表为里昂大学校长儒朋（P. Joubin），中方代表为蔡元培。中法两国人士共同组成中法大学协会，计会长两人，中方为蔡元培，法方为雷宾（Lépine Jean），吴稚晖则被推为里昂中法大学校长。7月，公开招考第一批学生，预定北京、上海各招20名，广州招100名。北京的考试由李石曾亲自监考，上海由吴稚晖主持，广州则由革命政府教育厅主持。[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5, 85页]第一年实际从国内招生127名，加上在法国就地考试招收的11名，共招生138名。

不过以里昂中法大学相对微薄的经费（计有中国政府年10万法郎，法国年7.5万法郎，以及专门资助粤籍学生的年8万大洋），根本谈不上办一所正规大学，实际上只起到一个大学预科或法语补习学校的作用，以及提供食宿的场所。该校学生除在本校学习外语外，都分散在里昂的不同校院学习相关专业。

里昂中法大学的正门（摄于1920年代）

吸收勤工俭学的教训，里昂中法大学的招生原则考虑了申请人的学历和经济能力：考生起码要有中等学校毕业水平，验交毕业证书方准报考。考生考取后，学费由校方负担，而且广东省籍学生待遇更为优厚，不仅往来川资、伙食费等均由学校供给，每年还给津贴二百元。[19]但第二年因广东陷入混乱，陈炯明承诺的常年经费断绝，里昂中法大学遂无力再在国内招生。于是就学人数不再增加，只能根据缺额，每年从在法的勤工俭学生中录取若干补齐。1927年以前，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主要由广东政府、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提供，1921—1926年度的总经费依次是59.78、39.78、49.29、46.57、76.63、87万法郎；自1927年度开始，大学的常年经费完全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从法国退还的庚款中拨付，大多数年份都在85—115万法郎之间。[[葛夫平 2000, 页105]]

1926年以后，广州中山大学和北平中法大学开始每年选拔少数优秀毕业生到里昂中法大学进修，北平中法大学的选拔一直延续到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为止。1940年法国沦陷，不久校舍被征为德军兵营，中国留学生被迫迁到市里居住，直到1944年校址才被收回。从1921年至1947年，里昂中法大学在校学生人数每年约为80—130人，除战时5年外，每年均有15—20名学生毕业离校，同时有相同数目学生入校。[[李书华 1963, 页45]]从1943年起就再无新生入学，拖到1951年停办，前后共招生473人。这些学生由于基础较好，加上经费、组织方面的保障，留学效果较前大为提高，因此大部分学有所成，回国后不少留在教育学术界，成为留法派的

主力军。后来北平研究院的骨干人才，如刘为涛、张玺、周发歧、陆鼎恒、郑大章、林谔、尹赞勋、朱洗、朱彦丞、沈宜甲[20]等均出自里昂中法大学，其中如朱洗等还是勤工俭学生又考入中法大学者。

与里昂中法大学同时兴办的还有中比大学。比利时有很大的法语区，许多学生亦通过留法渠道前往比利时就读，尤其在比利时的晓露槐（Charleroi，今译沙勒罗瓦，位于比利时法语区）有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名为“晓露槐工业大学”（似为今之Haute Ecole provinciale de Charleroi - Université du travail，实为高等专科学校，亦称劳动大学）。因该校工艺理论与实习并重，所以留比的勤工俭学生大都来此校。1920年10月，褚民谊、萧旭东曾代表中方到比利时访问晓露槐工业大学校长耶洛（M. Hiernaux），商量比利时将退还庚款合办中比大学等事宜。耶洛校长也主张：如果与工业大学合办一个中比大学，可望从比政府得到补助经费，同时亦可促成庚款退还早日兑现。于是双方决定合办一所中比大学。组织大纲确定后，萧回国，报告教育部总长范源廉获得支持，旋由中法大学北京办事处向各方筹集经费十万余法郎，请晓露槐工业大学积极筹建“晓露槐工业专修馆”。1920—1924年中国政府拨款补助留欧的勤工俭学生，其中就规定留比者与留法者同等待遇。从1921年起，便陆续有中国留学生到晓露槐工业专修馆学习，最初有预科39人，本科12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这些人原来都是勤工俭学生，现在依靠各自省里的补助金或中法教育团体的补助金，平均每月可拿到250—300法郎的助学金。蔡元培的儿子蔡柏龄即曾在该校学习。[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7, 页29—31]

中法里昂大学和中比大学有许多共同点：一、它们都与官方有较密切联系，从不同的政府渠道得到经费支持，并且根据经费体量决定招生规模，这与勤工俭学运动截然不同；二、它们都与勤工俭学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承继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留学形式，消化了不少勤工俭学生，也可以看作是对前一运动的一种补救措施；三、它们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而类似于寄宿部和语言学校性质，依附于其他大学之中；四、它们都具有运动所在国退还庚款兴办中国教育的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国内的北平中法大学也继续得到发展，借鉴法国的大学区制度，该校包含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还设立了研究所。由于李石曾对法国学术的推崇，中法大学下设机构的名称也多用法国著名学者命名，如称社会科学为孔德学院（纪念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Auguste Comte, 1798—1857），称文科为服尔德学院（即伏尔泰，1694—1778），理科为居里学院（Pierre Curie, 1859—1906），称生物学研究所为陆谟克学院（即拉马克，Lamarck, 1744—1829）。中法大学的首任校长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1920—1930），因蔡元培事务繁多，校长一职曾由李石曾、李书华、李麟玉相继代理。1931年李麟玉正式担任中法大学校长，直到1950年学校结束。全盛时期的中法大学，下设机构包括海内外附属单位在内达35个，大学部涵盖文、理、法、医、药、商学等学科，教职员一百五六十人，人才济济，藏书丰富，仪器设备均属一流。1950年与华北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工业学院，即今天的北京理工大学。

中法大学作为私立学校，发展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足的经费保障。中法大学的经费来源中，法国退还庚款占绝大部分。1925年4月，中法双方达成解决退还法国庚款协定。根据该协定，成立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5, 页46]从1926年1月起，每年拨交美金20万元，充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之用。自1931年1月起，此款增至每年美金25万元，至1947年庚款付清之年为止。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不定款项的资助。由于李石曾在争取退款中的功绩和法国方面的关系，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实由李石曾掌控。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将中法大学视为“中法间教育文化事业之最主要者”，故为该会“最大最要之事业，历次会议，中法两国代表团对之均力予赞助。”[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5, 页47]以1930年经费为例，基金利息为7万元，中法基金每年补助费45万元，法国庚子赔款补助费15万元，学生缴费10894元。[[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5, 页30]]可见中法基金及庚款的补助数额已占占总经费的近90%，而学费仅占1.6%。后来李石曾等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北平研究院、天然博物馆等机构，中法基金也都给予补助。

北京中法大学对沟通中法文化，培养科学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该校作为国内少数以法文为第一外国语的学校之一，除向国内介绍法国文化，向法国选拔输送留学生外，还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演。据不完全统计，1926—1937年间，中法大学先后邀请了十余名法国学者来校演讲。如1926年10月14日，法国电学家白兰（M. Edouard Belin）到校演讲，介绍他发明传递图像电报的经过，并利用北京至沈阳间的电话线作了现场演示。1931年10月16日，物理学家朗之万（Paul Langevin）在中法大学礼堂做《太阳热之起源》演讲，由严济慈翻译。

北京中法大学可以说是李石曾创办的最成功和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正如李书华所评价：“中法大学即沟通中法两种文化之高等教育机关……规模宏大，人才众多，校舍图书、仪器均极完备，堪称国内优良大学之一。”[[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7, 页1—2]]中法大学既标志着李石曾发起的留法教育运动达到成熟阶段，也是他后来推动教育改革实验和创建北平研究院的重要基础。因与法国的关系及在国内的特殊地位，众多留法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汇集于此，中法大学遂成为留法派的大本营。

五 结论

李石曾从招募和培训赴法华工开始，历经发起俭学会和勤工俭学运动，直到私立中法大学建立，不断摸索，屡经曲折，使一部分留法学生走上比较正统的学术之路，在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足以与留英美学者相比肩的留法派。留法运动虽然形式多变，但是作为其一贯最积极的推动者，李石曾的留学理念贯穿始终，从而成为留法派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概言之，李石曾最初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在法国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把提倡科学教育看作改良社会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发起赴法留学运动并一再扩张规模。然而，由于片面追求规模忽视质量，加之缺乏政府当局及社会力量的必要支持，留法教育运动历经磨难与挫折。在现实困难面前，他及时调整策略，通过政府和庚子赔款的资金创办中法大学，以此为基地培养和选拔高素质人才赴法留学。中法大学的建立标志着李石曾发起推动的留法教育运动走向正规化和学术化，为后来模仿法国制度实施教育改革和最终建立以留法学者为主体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打下了基础。

李石曾不遗余力地鼓吹法国的学术与思想，与他的政治理想、个人性情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他较为全面地接触了法国的政治、思想、科学、教育、经济等领域，与法国文化界和政界建立了紧密的关系，从而使他深信法国的学术和教育制度都是优越的，而且适合中国。他比较各国学术后认为，居友[21]优于尼采，蒲鲁东优于马克思。德国、日本是专制的，是“好利”之国；法国、中国是民主的，是“好义”之国。[[李石曾 1980g, 页229]]出于这种对法国近乎偏执的热爱，他不但大力推动留法教育，还力图在各个方面引入法国的制度和模式，不仅把北平中法大学俨然办成一个法国式的小型大学区，还效仿法国卢浮宫、歌剧院创立故

宫博物院、中华戏曲音乐学会等。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20世纪初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变革的年代，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带来的种种进步的政治思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中风靡一时。和李石曾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重视法国文明，如陈独秀就宣称法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创造者。[[陈独秀 1915]]同时法国还产生了许多像巴斯德、庞加莱那样大师级的科学家。可以说，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18、19世纪法国民主自由思想和科学的影响，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思想的影响。[陈三井,1980,7页]

所谓留法派是随着赴法留学的持续进行而逐渐形成的，以李石曾为代表的新世纪第一批留法群体，包括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留德，曾数次到法）、褚民谊等是留法运动的发起者，李石曾在其豆腐公司中开展工人教育，虽未培养出卓越的科学家，却产生了李广安、齐云卿等留法事业的中坚份子，并为后来的勤工俭学运动提供了实践经验。留法派的干将之一李麟玉也是随着华工一起到法的。在俭学运动中，一些留法派的骨干人才如李书华等开始涌现，声势浩大的勤工俭学运动持续时间虽短，但在此后的十余年内不断有学生学成回国，而以造就高素质学者为目标的中法大学成立后，更是造就了留法派的主力军，将留法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当然，许多人留学法国并不是通过上述途径，但李石曾能够把其中的佼佼者引为己用，如严济慈、徐悲鸿、赵承燾、徐炳昶[22]等均被委以重任。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李石曾的政治地位一度上扬，随后与蔡元培一起推行以法国为榜样的大学区制度改革。一时李石曾及其留法派的风头甚至超过留英美派，并几乎垄断整个北方学界。后来留法派与留英美派之间产生龃龉，分别建立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造成了我国近代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分裂。在北平研究院，李石曾延揽了李书华、严济慈、周发歧、刘慎谔、陆鼎恒、赵承燾等一批最杰出的留法学者，并继续以新的形式派遣年轻人留学，培养了钱三强[23]等优秀的科学家，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中法两国间的科技交流，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致谢 在本文写作中，承蒙导师刘钝先生、郝刘祥研究员指导，多次提出详细修改建议，特此致以诚挚谢意！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M. Basid-Bruguière 1998. 李石曾与中法文化关系. 陈三井译.《近代中国》(126): 169—176.

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5.《北京中法大学史料》.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编写组 1997.《北京中法大学史料续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蔡元培(1979).

在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见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卷.175—177.北京:北京出版社.

陈独秀 1915.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陈纪滢 1982.《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陈三井 1980. 民初西南大学之倡议与弃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 363—386.

陈三井 1988.《勤工俭学的发展》.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冯自由 1987. 新世纪主人张静江.《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210.

葛夫平 2000. 关于里昂中法大学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5): 94—131.

- 公孙旬 1992.《李石曾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近代史研究》(4):150—161.
- 洪震寰 1995.清末的“远东生物学研究会”与“豆腐公司”初探·《中国科技史料》·16(2): 19—22.
- 霍益萍 1997.法国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立场和态度·《近代史研究》·(1): 149—159.
- 李璜 1974.十年辛苦不寻常·台北《传记文学》·25(3): 22—28.
- 李璜 1973.巴黎现存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救济实况档案摘要·台北《传记文学》·23(4): 15—20.
- 李璜 1978.《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 李吉奎 2005.《梁士诒》·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石曾 1930.《大豆》(订正本再版).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
- 李石曾 1980a.肉食论·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文集》(上册,263—278).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李石曾 1980b.石曾笔记·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文集》(下册,1—226).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李石曾 1980c.留法俭学会缘起及公约·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文集》(上册,212—214).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李石曾 1980d.谈留学诸事致吴稚晖函·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文集》(下册,304—310).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李石曾 1980e.在北京留法俭学会讲演会演说词·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文集》(下册,227—230).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李石曾 1980f.谈中法教育·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文集》(下册,233—236).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李石曾 1980g.中法德日之比较·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文集》(上册,229—236).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李书华 1974.辛亥革命前后的李石曾·《传记文学》·24(2): 42—46.
- 李书华 1963.十年留法·台北《传记文学》·3(4): 39—46.
- 李宗侗 1963.由曲阳到光州·载台北《传记文学》·3(6): 27.

刘桂生·赵原璧 1998. 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渊源.《社会科学战线》.(3): 179—184.

刘厚 1974. 里昂中法大学始末记.见杨恺龄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一百十岁诞辰纪念特辑)》.世界社中国同志会.

罗平汉 2002.《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世界社 1916a. 留学之组织.见世界社编.《旅欧教育运动》(49—70).旅欧杂志社发行.

世界社 1916b. 华工教育之组织.见世界社编.《旅欧教育运动》(71—97).旅欧杂志社发行.